論　　著

# 女子需要什麼科學常識？從「人的教育」與「賢妻良母」之爭談新文化的知識觀 *

黃　相　輔 **

## 摘　　要

本文以五四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為中

* 本文初稿完成於作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期間，特別感謝施陸(Erik Schicketanz)指引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網路資源，並協助翻譯日文資料。作者也感謝張哲嘉教授在修稿過程中的建議，周敘琪、陳姃湲與連玲玲三位教授對賢妻良母主義流變的指正，以及二位匿名審查人使本文更加完善。
收稿日期：2018 年 9 月 3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心，探討「人的教育」與「賢妻良母」兩種教育理念的對立，以及其中衍生的科學知識觀。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以培育賢妻良母為宗旨，盛行男女內外有別思想，並重視女子家事科目實踐。新文化運動興起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強調人的覺醒、人的解放等新觀念，企圖打破傳統束縛。這種思潮也擴及到女子教育的改革。由章錫琛、周建人編輯的《婦女雜誌》，便是 1920 年代倡導激進改革的代表。《婦女雜誌》追隨日本作家與謝野晶子的思想，提倡「人的教育」來對抗賢妻良母思想，認為教育應該以培養獨立人格為宗旨，使學生成為完整的「人」。周建人的二哥周作人也在《婦女雜誌》上發表一套常識綱要，闡述女子應具備什麼樣的科學知識，廣受讀者好評。周作人的常識綱要從個人身心與性的知識開始，到生物學與人類社會，再到關於自然現象的物質科學，構成從個人逐步向外層遞的知識脈絡。另外，周作人對特定知識如進化論、遺傳論、社會學（人類學）的強調，也可看出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社會文化進化論」(sociocultural evolution)在 20 世紀初的流行，反映了新文化人士的知識觀。無論在章錫琛「人的教育」論述或周作人的常識體系中，「實用」的家政技藝與職業教育皆毫無立足之地。

關鍵詞：《婦女雜誌》、賢妻良母、女子教育、與謝野晶子、周作人

## 前　言

1915 至 1925 年的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分子追求婦女解放與男女平權等理想，積極論述性別、戀愛、家庭、女子教育與職業問題。其中一個涵蓋層面廣泛的問題便是：女子需要什麼科學常識？這個問題在五四後大力呼籲女子教育改革的《婦女雜誌》曾掀起一陣熱烈討論。[1] 它既牽涉到新文化人士對「賢妻良母」（或稱「賢母良妻」）教育宗旨的駁議，也反映出時人對科學的觀念——究竟什麼領域的知識屬於科學？何種知識架構才是「有用」且適合新時代的青年男女？支持或反對賢妻良母的陣營有不同的見解。

研究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論著，都注意到當時普遍「男女有別」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及其背後依據的「賢妻良母主義」。[2] 男女差異不難從課程看出，例如教育部在 1912 年

---

1 歷來關於「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定義，研究者有許多不同的主張。例如周策縱就傾向將「五四運動」採廣義用法，同時包含 1919 年的學生愛國運動（五四事件）與在此之前就展開的新思潮與西化的新文化運動。參見周策縱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臺北：龍田出版社，1980），頁 1-7。本文所指稱的「五四」，特別指 1919 年的五四事件。因此在行文時所謂「五四前」、「五四後」分別指「1919 年以前」、「1920 年以後」。筆者對「五四時期」的起訖則採廣義的範圍，即涵蓋新文化運動，大致上從 1915 至 1925 年。這是因為本研究以《婦女雜誌》為中心，這段時期正好涵蓋從創刊到本文主角章錫琛離職，以及中間由於五四事件造成雜誌走向的轉變。《婦女雜誌》這段脈絡於後文說明。

2 例如 Paul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Helen Schneider,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規定高等小學科目包括修身、國文、英語、算術、理科、農業等，女子另加縫紉，免習農業。[3] 女子中學及師範學校，雖同樣有理化、數學等科學課程，使用教科書比照男校，唯另有家事、縫紉、園藝等男校沒有的家政科目。[4] 女子教育中強調家事與治家重要性的做法，固然可追溯自儒家傳統「齊家」以及男女「內外有別」思想，也很大程度地揉合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為女子教育現代化與富國強兵目標而新打造的賢妻良母主義。[5] 賢妻良母論者常以男女天生體質與心理上的科學差異為基礎，闡述女子適合以家庭為活動場域，並負有生育下一代強健國民的「天職」。此外，從 19 世紀後期開始在美國方興未艾的「家庭經濟」（home economics，即「家政學」）運動，提倡教導主婦科學化地管理食衣住等日常消費活動，也帶動日本與中國的家政教育潮流。以上來自日本或西方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深刻影響了清末民初以來的女子教育體制。[6]

---

3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76。

4 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續）〉，《國聞週報》（上海），卷 3 期 50（1926 年 12 月 26 日）；家政課程的線索亦可參考商務印書館或中華書局的教科書廣告，詳後文說明。

5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Yung-chen Chiang, "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25," *Gender and History* 18:3 (November 2006), p. 521.

6 有關家政學及家政教育在中國的譯介與發展，參見 Helen Schneider,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周敘琪，〈家庭經濟與現代主婦——邵飄萍譯介《實用一家經濟法》析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賢妻良母主義在五四時期遭到新文化知識分子強烈質疑。新文化人士鼓吹婦女解放，不滿意以賢妻良母為宗旨的女子教育，提倡新的教育與知識觀。這些言論在五四前，有《新青年》為代表先聲；[7] 而在五四後，章錫琛(1889-1969)、周建人(1888-1984)共同編輯的《婦女雜誌》，又塑造另一高峰。章、周二人在社論文章〈我們今後的態度〉中，主張婦女要受到與男子同等的教育：「從前以造成賢母良妻為婦女教育的唯一目的，這在現在，凡是略有思想的人，都已知道是非常錯誤的了」。他們認為時下無論是男子還是女子教育都需要根本的改造，主張以日本作家與謝野晶子(1878-1942)所謂「人間性的教育」取代「機械化、奴隸化」的家事與職業教育，務使「人類最緊要的愛與創造的兩大本能，無限的發展，成為一個完全的『人』」。[8] 章、周提倡的「人間性的教育」，或稱「人間性教育」、「人的教育」。總的來說，係主張女子教育宗旨應該是培養女子的獨立人格，而不是預備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所以「一切知識，也要注意到『人』字，務要啟發她們『人』的知識」。[9]

然而，究竟什麼是女子在「人的教育」中需要學習的知

---

月），頁 1-50；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為例〉，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233-251。

7 呂芳上，〈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收入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 157-254。

8 記者，〈我們今後的態度〉，《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924 年 1 月），頁 6-7，引句出自頁 6。

9 陶怡，〈婦女教育的永久計劃〉，《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924 年 1 月），頁 47。

識？章錫琛與周建人經常強調性教育——不管是生物還是人類的生殖相關知識——的重要；除此之外，卻從沒有對「人的教育」該有的學科作通盤的申論。在《婦女雜誌》上曾經對此問題有完整論述的是周作人(1885-1967)、向警予(1895-1928)與蔣鳳子。他們先後申論女子教育該有的科目，其中又以周作人在 1923 年發表的〈婦女運動與常識〉一文最受矚目，[10] 不但率先具體論述新女子（以及男子）需要的全套科學知識體系，受到讀者熱烈迴響，也廣被向警予、蔣鳳子以及其他作者引用。周作人為《婦女雜誌》讀者擘劃的這套常識教育藍圖，不僅說明了他的教育觀，也反映其心目中一種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觀或科學觀。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賢妻良母主義下的家政教育，還是《婦女雜誌》同人提倡的「人的教育」，科學皆占有重要功能。新文化運動標榜「賽先生」，反對傳統社會與文化體制，這種對傳統權威與價值的挑戰並不是突然產生，而是始自清末維新之際，作為舶來品的西方科學，逐漸從原本「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工具，轉變為老朽中國賴以脫胎換骨的思想典範。到了新文化運動高潮的 1920 年代初，傳統文化的權威更加大幅削弱，科學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思維與價值，儼然已成為眾多中國知識分子新的權威甚至信仰。[11] 即

---

10 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1（1923 年 1 月），頁 8-11。

11 前輩學者對此課題已有很多論述。例如周策縱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頁 288-293、431-451；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尤其是談「煩悶的本質」與「進化思想」的二章，見頁 129-135、251-269。

便是家政，也脫離不了科學的影響。清末民初許多知識分子，提倡以西方科學知識改良日常家事，並將家庭事務的改良，連結至社會與國家整體的復興。更何況，賢妻良母論者對於兩性差異的論述，除了從傳統的社會角色出發，也仰賴新時代的科學證據添加薪柴。對銳意改革舊傳統的新文化人士而言，科學在新社會中的權威與在新知識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自是毋庸贅言。不論新、舊派，皆無法忽視科學已在中國未來的藍圖中佔有一席之地。

《婦女雜誌》以周作人為代表，對於科學常識與女子教育的意見，也提供我們另一種檢視五四科學文化遺產的角度。縱觀五四時期，以胡適(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為首的新文化人士，留下許多宣揚科學價值的論述，他們與其他立場不同的知識分子也不乏充滿張力的對話。最著名的就是 1923 年起的「科玄論戰」，主張科學萬能的「科學派」大將丁文江(1887-1936)，挑戰「玄學派」的張君勱(1887-1969)，並牽連眾多時人紛紛跳上擂臺參戰。科玄論戰涵蓋的內容龐雜，為反映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科學觀的良好櫥窗。[12]

---

12 「科玄論戰」起因為張君勱在清華學校演講「人生觀」，將人生觀與科學並列比較，並認為「人生觀問題之解決，非科學所能為力」而引起丁文江撰文〈玄學與科學〉為科學辯護。雙方在不同期刊上你來我往，這場論戰也成為後世研究五四時期思想的焦點，在此不贅述過程。上海亞東圖書館集結雙方文章的論文集《科學與人生觀》是科玄論戰研究的重要材料，後世重印版本眾多，例如：張君勱、丁文江等著，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臺北：問學出版社，1977）。對科玄論戰與五四科學文化的簡介，參見嚴搏非，〈論「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理解〉，收入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頁 198-214。

論戰涉及到三個課題：「科學」與「知識」的定義、科學體系的分類、科學在教育的地位。作為胡適的同事與新文化知識分子的代表，周作人並沒有在科玄論戰中積極發聲，然而這不表示他對科學毫無興趣——相反的，他在〈婦女運動與常識〉提出的科學常識綱領，透露出對於上述課題的見解，頗有許多部分能分別與科學派、玄學派的觀點對照。此外，科玄論戰雖然討論了當代科學與哲學思想上諸多重要問題，卻沒有著墨科學與婦女問題的關聯，各方論述不具有性別意識。與此相較，《婦女雜誌》裡女子科學常識或教育相關論述，特別是出自女性作者（讀者），如向警予、蔣鳳子等人的作品，能補足我們對於五四時期婦女與科學文化的認識，這是過往史學研究常常忽略的一部分。

本文即以《婦女雜誌》為中心，探討五四時期對女子科學常識教育的芻議，以及其背後「人的教育」、「賢妻良母」兩種對立教育理念之爭的脈絡。商務印書館自 1915 年起發行的《婦女雜誌》，不但是當時全國影響力最廣泛的商業性婦女刊物，也是五四時期各種婦女問題論戰的重要場域。五四前的《婦女雜誌》是主張溫和改革的文化保守立場，也是賢妻良母價值的擁護者；然而在 1921 年改由章錫琛主持後，順應潮流轉型成婦女解放的旗手，大談自由戀愛與離婚等議題，內容趨向激進。[13] 這種前後風格的轉變，使《婦女雜誌》

---

13 商務印書館及旗下雜誌因應五四浪潮的改革過程，見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38；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

成為後世學者研究五四時期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豐富來源。江勇振即綜合探討《婦女雜誌》在 1915 至 1925 年間關於女性(womanhood)與母性(motherhood)的性別論述；[14] 這些論述無論其目的是支持或反對賢妻良母，都時常援引當代生物學研究指出的男女差異，以及西方女性主義者或性學家的著作，例如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靄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等人。不過，江勇振的論文偏重於性別觀的討論，並沒有著墨女子教育與科學常識。至於民初及五四時期以後的女子教育中，關於賢妻良母、家事、天職等概念，已有豐富的前人論著爬梳，例如 Paul Bailey 與 Helen Schneider 的專書，Schneider 尤其對於 1920 至 1940 年代的家政教育思想與政策推行有詳細的介紹。[15] 而 Schneider 以在杏壇前線的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俞慶棠(1897-1949)與張默君(1884-1965)等人為重心討論，史料運用上也以教育刊物與政府檔案為主，對於五四後態度傾向激進改革的《婦女雜誌》同人並未注意太多。因此本文以《婦女雜誌》為中心的討論，期望能呈現五四後這段女子教育宗旨論戰的細節，反映當時讀者對於賢妻良母及家事教育的態度變化，以及其中所衍生出關於科學常識教育的知識觀。

---

14 Yung-chen Chiang, "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25," *Gender and History* 18:3, pp. 519-545.

15 Paul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p. 83-119; Helen Schneider,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p. 57-80.

# 一、五四前賢妻良母主義與家政教育的流行

《婦女雜誌》在五四前由王蘊章(1884-1942)主編，當時知名的女教育家胡彬夏(1888-1931)也主持過第 2 卷。二人主編期間的《婦女雜誌》不乏肯定賢妻良母論及中國傳統婦德的文章。王蘊章是通曉英、日文且舊學根柢深厚的文人，勤於譯介西方知識，同時亦鍾情於傳統詞章的創作與閨秀文藝材料的編纂。[16] 胡彬夏先後留學過日本、美國，受西方教育影響極深，勤於在雜誌上發表社論，暢談其教育與社會改革理念。值得注意的是，這二人筆下都很少直接談到賢妻良母。王蘊章原本就極為低調，甚少發表個人對婦女問題的意見。胡彬夏僅有一次，在回覆讀者質疑賢妻良母主義為「妾婦教育」時，為其辯護，然而語帶保留，甚至批評「今所盛倡之賢母良妻，猶為男子心目中之賢母良妻也，或非女子所能心會意合」，並感嘆美國婦女不常說賢母良妻，但達到此美德嘉行者，卻反而較盛倡賢母良妻的日本與中國為多。[17] 留美經驗使胡彬夏極為推崇美式家庭生活，並由此肯定家庭在社會中的價值。她在〈美國家庭〉一文中，描寫美國主婦治理家事有條不紊，認為家庭不但是主婦發展學識智能的場

---

16 關於王蘊章及胡彬夏主編期間的《婦女雜誌》詳情，見黃相輔，〈居家必備：《婦女雜誌》在五四前的通俗科學啟蒙(1915-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0（2018 年 6 月），頁 85-128。王蘊章的文藝志趣，另見胡曉真，〈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2006 年 3 月），頁 55-89。

17 彬夏，〈節錄復施淑儀女士書〉，《婦女雜誌》（上海），卷 2 號 4（1916 年 4 月）。

域，也是丈夫得以休養、子女得以健全發育之處，因此家庭能為社會分勞，不可忽視主婦治家之功。[18] 由此可見，胡彬夏雖然不明言賢妻良母，其理想中主婦治家的社會責任，即使與賢妻良母主義不完全相符，仍有些異曲同工之處。

五四前的《婦女雜誌》對賢妻良母的推崇，在當時的婦女刊物中並不稀奇；無論是最早創刊的商業性婦女刊物《婦女時報》(1911-1917)，還是中華書局的《中華婦女界》(1915-1916)，都不乏類似論調。「賢妻良母」乍看之下似乎是中國傳統禮教，其實是源自受西方影響的近代日本。儒家傳統雖然有婦女「三從四德」、夫婦「內外有別」等概念，但思想與做法實際上與「賢妻良母」有很大差異。東亞的賢妻良母論述，濫觴於日本明治初期以中村正直(1832-1891)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在幕府末年曾以留學生監督的身分赴英國考察。在英國的文化衝擊經驗，使中村正直深思女子教育的重要，返國後提倡「善母」之說（善良ナル母ヲ造ル說），認為唯有將婦女培養成具備充分知識與教養的「善母」，方能孕育下一代良好的人民，日本才能真正踏上現代化之路。然而到了明治中期以後，隨著國家機關將女子教育正規化與體制化，賢妻良母思想也產生質變，從中村正直注重男女平等、文明西化的教育理念，轉變成強調女子為人妻母的角色、養成溫良貞淑等適合持家的美德，以及家庭對國家與社會的責任。此即為更具文化保守色彩的「賢妻良母主義」。在著名婦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漢學家服部

[18] 彬夏，〈美國家庭〉，《婦女雜誌》（上海），卷 2 號 2（1916 年 2 月）。

宇之吉(1867-1939)等人努力下，藉由招收留學生或協助鄰國建立新式學制，賢妻良母主義亦向中、韓輸出，流行於東亞。[19]

清末維新志士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提倡女子教育，引入賢妻良母論述作為思想基礎。例如梁啟超(1873-1929)於戊戌變法前一年（1897 年），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系列文章中的〈論女學〉，雖然未提到「賢妻良母」之類的詞彙，但是綜觀其內容，從重視母親生育教養子女的胎教、母教，到提倡興女學，皆十分符合中村正直的「善母」之說。在 1920 年代率先研究中國婦女教育與生活史的陳東原(1902-1978)，便認為中國「良妻賢母的婦人觀」，始於梁啟超此篇〈論女學〉。[20] 學者對梁啟超的女子教育思想譜系有不同的觀察：例如胡纓認為梁的理念龐雜，混合了傳統儒學、國族主義與西方啟蒙思想，仍強調道德教化與國家興亡在女子教育中的成份；陳姃湲則認為，梁受到中村正直的影響，二人對女子教育的主張有一脈相傳之處，擘劃的是西化開明的婦女形象，而不是後來轉向保守、國族主義化的賢妻

---

19 相關論述見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18-22（尤其參照頁 21、表一的比較）44-54、60-67、78-129；Mamiko Suzuki, “Shimoda’s Program for Japanese and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2 (June 2013), pp. 1-9; Masako N. Racel, “Finding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Meiji Intellectuals and the Japanese Construction of an East-West Binary, 1868-1912,” (Ph. D. Dissertatio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011), pp. 106-153.

20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頁 323。此版本是據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8 年初版重印。

良母主義。[21]

梁啟超女子教育主張內涵的複雜不足為奇。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所吸收的西方知識與思潮，有不少是經由日本中介。在力求「開風氣」而求知若渴的需求下，各種讀物被大量翻譯引入；轉譯過程中難免囫圇吞棗，或由譯者揉合各家之說生新的詮釋。[22] 不同時期的賢妻良母思想，在短短十餘年內被引入中國。例如下田歌子的代表作《家政學》，便在 1902 至 1903 年之間，被不同譯者分別翻譯成中文出版，[23] 距梁啟超發表〈論女學〉尚未滿 10 年。因此清末民初的賢妻良母論述和群體，實為混雜著不同時期的主張，進步與保守並存的大雜燴。支持（或至少不反對）賢妻良母者，固然有根據傳統三從四德立論的守舊派，也有像胡彬夏這樣接受西方思潮而富於改革理想的人。呂芳上指出，賢妻良母的基本概念「實揉合了古代傳統婦德與近代民族主義勃興後『國

21 Ying Hu,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62-167;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60-67。

22 最有名的例子，即為嚴復譯《天演論》的相關研究，例如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5（2014 年 9 月），頁 129-187。另外，王汎森提出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多有「複合性思維」的特色，也與翻譯過程中的再創造，有異曲同工之妙，見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 307-316。

23 羅秀美，〈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單士釐的「女性文學」〉，《漢學研究》，卷 32 期 2（2014 年 6 月），頁 208。

民母』的理想」。[24] 這個兼具傳統禮教與現代化意涵的詞彙，對於時人而言，不全是舊的也不全是新的東西。Helen Schneider 認為，正由於賢妻良母在中國從來沒有明確的定義，才使得它持續長久，成為一種容易被各取所需的意識形態。[25]

各派支持賢妻良母的少數共識是對家庭倫理與社會功能的肯定，以及所衍生出來對家事教育的重視。王蘊章和胡彬夏主編的《婦女雜誌》，就刊登許多教導實用家事技藝，或譯介外國家政學原理的通俗文章。商務印書館也熱衷於出版各種家政相關書籍或教科書，在《婦女雜誌》上經常出現這一類標榜「女子必讀之書」、「女界最適用之圖書」的出版品廣告（見圖 1、圖 2）。廣告裡的教科書涵蓋家政、園藝、縫紉、烹飪等科目，遵照教育部規章編纂，以供女子中學與師範學校使用，可見當時女校家事教育之盛；教科書之

圖 1：民國初年的女子教科書廣告

[24] 呂芳上，〈兒女情短、英雄氣長？辛亥革命時期的性別與革命〉，收入呂芳上著，《民國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上冊，頁 257-291，引句出自頁 263。另參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頁 27-28，尤其是註 29 對賢妻良母眾多詮釋的說明。

[25] Helen Schneider,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66.

資料來源：《婦女雜誌》（上海），卷 2 號 8（1916 年 8 月）。

圖 2：民國初年的女子圖書廣告

資料來源：《婦女雜誌》（上海），卷 5 號 9（1919 年 9 月）。

外的各種讀物，從書名如《家事實習寶鑑》、《幼兒保育法》與《日用百科全書》來看，適合女性讀者的「女子常識」脫離不了與家庭相關的日常生活內容。[26] 以西方科學知識改良家政的想法，在五四前後皆相當普遍，甚至連一些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青年如邵飄萍(1886-1926)與惲代英(1895-1931)，都曾熱衷於家政學的原理及實踐。[27] Paul Bailey 指出，即使是以開明進步思想聞名的教育改革者蔡元培(1868-1940)，也主張合宜的女子教育應該增進家事技巧。[28] 蔡元培於 1916

26 〈商務印書館「女子必讀之書」〉，《婦女雜誌》（上海），卷 2 號 8（1916 年 8 月），無頁碼；〈女界最適用之圖書〉，《婦女雜誌》（上海），卷 5 號 9（1919 年 9 月），無頁碼。關於家政與日用生活常識內容在王蘊章時期《婦女雜誌》之重要地位，參見黃相輔，〈居家必備：《婦女雜誌》在五四前的通俗科學啟蒙(1915-1919)〉，頁 97-100、106-108。

27 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卷 43 期 3（2005 年 9 月），頁 107-190；周敘琪，〈家庭經濟與現代主婦——邵飄萍譯介《實用一家經濟法》析論〉，頁 1-50。

28 Paul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 112.

年在上海愛國女校演講女子教育精神，就鼓勵學生「益以學校中之新智識，則治理家庭各事，必較諸未受教育者，覺井井有條」。[29] 五四後，1921 年蔡元培撰文論近代西洋教育，亦直指西洋教育是世俗且重直觀的，「所教功課，無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識和技能......又盛興童子軍(Boy Scout)的教育，一切煮飯、燒菜、洗衣、縫衣......無一不實地練習」。[30]

「賢妻良母」論述正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流行於民國初年的教育界與婦女輿論界，被普遍視為女子教育的準則或規範。正如 1919 年江西義務女校校長，在十周年校慶大會演講中宣稱：「吾人十載以來，視為女子教育之目的者，亦曰養成賢母良妻」。[31] 陳東原在 1926 年回顧民初的女子教育，亦指出當時「辦女學者之思想，和其實際的教授方針，總仍向賢母良妻這目標的」。[32]

## 二、從反「賢妻良母」出發的「人的教育」

五四後高漲的新文化浪潮，促使商務印書館不得不因應輿論改革旗下刊物。章錫琛從第 7 卷（1921 年）起正式取代

---

29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臺北：國史館，1985），上冊，頁 472；原演講全文亦載於《東方雜誌》（上海），卷 14 號 1（1917 年 1 月）。

30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臺北：國史館，1986），中冊，頁 516。

31 〈學事一束：江西義務女校之紀念大會〉，《教育雜誌》（上海），卷 11 號 11（1919 年 11 月），頁 107。

32 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續）〉，《國聞週報》（上海），卷 3 期 50，頁 1。

王蘊章成為《婦女雜誌》主編。章錫琛原本對婦女問題沒有研究，初期多倚仗朋友周建人幫助供稿，後來在事務日趨繁忙下，索性向上級請求聘周建人加入《婦女雜誌》編輯部。[33] 章錫琛主編《婦女雜誌》期間，周建人便以各種筆名貢獻大量文章，[34] 甚至曾在同一期的「評壇」欄以三個分身占了 6 篇評論中的 4 篇。[35] 他們二人的合作無間，也能從分進合擊的撰文策略上看出：章錫琛時常先帶頭發言，緊接著下篇文章便由周建人以其擅長的生物或科學角度來切入論述同一題材。例如在 1925 年掀起軒然大波的「新性道德專號」，便是先由章錫琛闡述什麼是新性道德，隨後周建人再討論新性道德的科學基礎。[36] 二人對婦女問題的興趣更延伸到雜誌之外，聯合志同道合的商務印書館同事沈雁冰(1896-1981)與胡愈之(1896-1986)，以及關係密切的館外人士如周作人、吳覺農(1887-1989)等，組織「婦女問題研究會」，專事調查婦女問題與編印發行相關書刊。[37] 於是風格一新的《婦女雜誌》

---

33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16-117。

34 除了本名周建人、建人之外，在《婦女雜誌》上常用的筆名包括喬峰、高山、克士、健孟。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期刊作者研究平台，http://mhdb.mh.sinica.edu.tw/ACWP/（2018 年 5 月 8 日檢索）。

35 分別是：健孟，〈從絲廠女工罷工中得來的教訓〉；克士，〈女子參政會與女子勸進團〉；喬峰，〈「惡風」〉；克士，〈家庭制度的應當改革〉。見《婦女雜誌》（上海），卷 8 號 10（1922 年 10 月），頁 17-22。

36 章錫琛，〈新性道德是什麼〉，《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1（1925 年 1 月），頁 2-7；建人，〈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1（1925 年 1 月），頁 8-12。

37 其宗旨與發起人等細節，見〈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暨〈婦女問題研

高舉婦女解放的大旗，開始向「舊」社會的流俗積弊進攻，「賢妻良母」便為目標之一。

賢妻良母論預設家庭為女子的最終歸宿，以及根據男女先天生理、心理條件不同而分工的天職說，正是章錫琛與周建人大力抨擊之處。章錫琛在第 7 卷首號開頭之作〈到婦女解放的途徑〉，就先非難「近代自私自利的男性學者，也有用科學的論據來主張男尊女卑的」，接著駁斥女子的智能天生不如男子的說法。[38] 周建人批評，「『賢妻良母』這四個字是從來視為婦女唯一教訓的」，男子若強迫女子過這樣的生活，不合於人道；而女子「生理上雖有懷胎哺乳的官能，但一生專做一個孵卵器，自知不是她們唯一的命運……於是婦女解放的喊聲一起，婦女運動的潮流就高起來了」。總之婦女運動便是要爭取男女平等，「婦女在社會上應該怎樣生活，並不是男子可以給他們代定範圍的事」。[39] 為了釐清性別異同的科學根據，章錫琛主編時期的《婦女雜誌》刊登許

究會簡章〉，《婦女雜誌》（上海），卷 8 號 8（1922 年 8 月），頁 119-121。

38 瑟廬，〈到婦女解放的途徑〉，《婦女雜誌》（上海），卷 7 號 1（1921 年 1 月），頁 1-2。瑟廬是章錫琛在《婦女雜誌》上常用的筆名，見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頁 14-16，尤其註 57。然而要注意的是陳姃湲的分析不見得完全正確，例如她認為 Y.D.是章錫琛的筆名，但 Y.D.在 1920-1921 年間的文章多與日本見聞相關，也多次提及在日求學的背景，比較可能是 1919 年考取官費留日的吳覺農。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期刊作者研究平台與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http://mhdb.mh.sinica. edu.tw/mhpeople/（2018 年 12 月 4 日檢索）。

39 高山，〈婦女主義與賢妻良母說〉，《婦女雜誌》（上海），卷 8 號 5（1922 年 5 月），頁 15-16。

多從生理學或生物學等科學觀點來分析男女體質與心理差異的文章，在五年內就超過 20 篇以上，翻譯或原創作品皆有，[40] 其中許多出自周建人之手。例如在其中一篇的開頭，周建人解釋道：

> 自來對於男女，常抱一種成見，深信男女有極大的差別，并因這差別，分出男女的本分來。男子治外，女子治內，這是男女天然的活動範圍，如果女子想逾越出這範圍，去幹男子所常幹的事，便是不守本分。然試問這種觀念究竟從何而來？即根據什麼理由，定這種分工的規律？能够明白解答的人，恐怕很少。我們如果不肯盲從舊說，對於男女活動的範圍應該怎麼，要想加以深沉的考察，便不能不先知男女在生物學及心理學方面的差別如何。近代學者對於這方面的努力，實在替我們開闢不少的途徑，所以我們實在有一述的必要。

在介紹相關的各種科學研究結果後，周建人總結：「照上面所說，無論從細胞學上或心理學上，都找不出男女智慧高下的證據」。他認為因為婦女發展才能的機會少於男子，加上負擔生育的勞苦，才造成女子學問家遠少於男子。「自來的社會，又竭力否認婦女有才能的必要......認〔為〕生育是婦女唯一的任務，因而造成這樣禁錮婦女的環境」。[41] 周建人

[40] 翻譯文章例如美國惠斯黎著，周建人譯，〈男女的差別〉，《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 （1924 年 1 月），頁 247-257。原創文章例如楊賢江，〈男女精神上特徵的比較〉，《婦女雜誌》（上海），卷 7 號 8（1921 年 8 月），頁 32-36。

[41] 周建人，〈婦女主義之科學的基礎〉，《婦女雜誌》（上海），卷 9

的這番論述，是這時期《婦女雜誌》援引科學理論反駁男尊女卑說或賢妻良母論的典型說法。[42]

既然男女的才智高下沒有區別，章錫琛和周建人主張，女子應該受和男子同等的教育。這個核心思想衍生出不同的行動倡議，以這三種為主：首先是反對現行女子教育普遍的賢妻良母宗旨，以及在此宗旨下專屬於女學生學習的家事科目；其次是打破高等教育對女子的禁令；最後則是全面的男女共學(co-education)，即男女合校甚至合班一同上課。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主張並不是《婦女雜誌》首創，早自五四前就有許多新文化人士倡議。以著名的《新青年》為例，陳獨秀與胡適等人便多次宣揚女子與男子同等、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超越賢妻良母」。[43] 而在行動方面，例如爭取大學開放女禁，最著名的事件是甘肅女學生鄧春蘭於1919 年上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請求入學北大，並親赴北京請願。北大在隔年二月開始招收女旁聽生，開大學男女同校先聲。[44] 男女共學的辦法，在五四前僅適用於小學；據陳

號 4（1923 年 4 月），頁 2-7，引句出自頁 2、7。

42 不過章錫琛與周建人也承認男女在體質或心理上有差異的客觀事實。江勇振便指出，《婦女雜誌》諸作者同意科學上的男女差別，反對的是從生理差異來定男女的才智高下。見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 （2004 年 12 月），頁 45-46。

43 例如陳獨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上海），卷 1 號 5（1916 年 1 月），頁 1-4；胡適，〈美國的婦人〉，《新青年》（上海），卷 5 號 3（1918 年 9 月），頁 213-224。《新青年》中對婦女問題的討論，參見呂芳上，〈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160-167。

44 鄧春蘭投書可見〈時事要聞〉，《婦女雜誌》（上海），卷 5 號 9（1919

東原批評，這不過是由於教育行政上的便利，作為小縣城無法舉辦女學時的補救措施。[45] 五四後有更多全面開放男女共學、男女教育均等的呼聲，類似的意見在《婦女雜誌》上屢見不鮮。例如在第 10 卷第 11 號（1924 年 11 月）的「討論會」欄，以「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為徵文題目，刊載 10 位讀者的投稿，持贊成意見者有 6 位，其中更有 4 位主張實施男女共學，或是宣稱男女共學已經不成問題。[46] 類似的徵文企劃是章錫琛常用的手法，他善於利用《婦女雜誌》作為公眾討論的平臺，在炒熱話題之餘，引導輿論方向並吸引青年讀者投入認識婦女問題。

以往的研究提到，章錫琛時期的《婦女雜誌》最常引用愛倫凱、靄理士等西方學者來做為其論述的思想資源。[47] 然而在反對賢妻良母教育方面，章錫琛與周建人追隨的精神導師卻是同時代活躍的日本作家與謝野晶子（以下簡稱晶子）。晶子原以詩作聞名，也關注現實社會時事的評論，經

---

年 9 月）；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頁 386。

45 蔡元培的回應，與陳東原觀點，可見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續）〉，《國聞週報》（上海），卷 3 期 50，頁 2。

46 見「討論會」內諸文章，《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1924 年 11 月），頁 1729-1739。其中持正方意見者，楚振元、姜長麟未對男女共學表示看法，寧人、雄民、權伯華明白主張男女共學，徐寶山雖未提到「男女共學」這詞彙，但依文意也是傾向共同教育。

47 例如江勇振、許慧琦的論文皆有分析章錫琛在討論性道德問題時對愛倫凱思想的大量引用。見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29-92；Yung-chen Chiang, “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25,” *Gender and History* 18:3, pp. 519-545.

常在女性文藝期刊《青鞜》(1911-1916)上發表對婦女問題的看法。她在 1920 年出版的論文集《女人創造》中提出「人間性的教育」（人間性の教育），[48] 將愛與創造的本能稱為「人間性」，認為人間性是使人得以獨立生活（自律獨存の生活）的要素，所以教育應該以培養人間性為宗旨。晶子批評當代的日本，無論是男子或女子教育都在壓抑人間性——男子很早就投入某種專門職業的訓練，成為職業與其經濟價值所役的奴隸；女子則被培養作賢妻良母，成為男子與家族制度的奴隸，家政、修身科都灌輸女子特定的道德而殘害女子的精神獨立。晶子提倡「人間性的教育」，實為回應明治後期以來，日本愈來愈嚴密的國家體制與保守的賢妻良母主義。

晶子〈人間性の教育〉即是章錫琛和周建人在社論〈我們今後的態度〉中引述的來源。有趣的是，雖然章、周筆下屢屢提及「人間性的教育」或「人的教育」，《婦女雜誌》也曾翻譯過好幾篇晶子的文章，卻從沒有直接刊載這篇〈人間性の教育〉。《婦女雜誌》翻譯晶子對女子教育的論述，是 1925 年 6 月「女學生號」中的兩篇文章〈女子的自修自學〉和〈女子與高等教育〉。[49] 前者原題為〈女子の自修自學〉，原載《文化生活研究》，從文末提到因為「時間的限

---

48 與謝野晶子，《女人創造》（東京：白水社，1920），頁 12-23。全書可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站線上閱覽，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61742（2018 年 5 月 16 日檢索）。

49 與謝野晶子著，無競譯，〈女子的自修自學〉，《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6（1925 年 6 月），頁 996-1009；與謝野晶子著，張嫻譯，〈女子與高等教育〉，《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6（1925 年 6 月），頁 1059-1062。

制」所以「在這里告終」來看，似乎脫胎自演講的講稿；後者則是《女人創造》中的另一章〈女子と高等教育〉。[50] 從這兩篇文章來看，章、周及其支持者此前對於女子教育的言論，可說是忠實依循晶子的思路。例如晶子批評說：

> 向來的女子教育，是以男尊女卑的思想做基礎的。女子的本務，是為女性而對於男子和種族服務，女子的生活，全部是生殖生活……所以施以賢母良妻主義的教育，女子教育的目的便已完了……然而照我的意見，是不能滿足於這種的教育的。既然自覺到女子也是一個的人格者，便須受人格本位的教育。換一句話，要受產生人的個性的全部的教育。……
>
> 我以為所謂女子教育的名目，已經是舊式的了。人生無論在那種階級，都該以男女協同為理想的。沒有男子本位，也沒有女子本位……從這意味說，就是學校除了一二特殊者外，一切都該以男女共學為原則。書物的專以婦女為對象，和報上的特闢婦女欄，我以為是留著所謂男尊女卑的因習的遺臭的。[51]

以上這套由反對「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主義」出發，推動「人格本位」的教育，希望達到「男女協同」理想而施行「男女共學」的論述，從思想到修辭，都在《婦女雜誌》的社論裡頻頻出現。

---

50 與謝野晶子，〈女子の自修自學〉，《文化生活研究》（東京），卷 1 期 2-11（1920 年 6 月-1921 年 4 月），頁碼不明；與謝野晶子，《女人創造》，頁 238-245。

51 與謝野晶子著，無競譯，〈女子的自修自學〉，《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6，頁 1003。

特別要注意的是，晶子對於職業教育也持批判態度，認為職業教育不過是使男子成為「貨幣的奴隸」，和女子被奴役於家族制度相比沒有兩樣，只是高等奴隸與低級奴隸的差別。章周二人認同這種看法，反對女子教育以職業為目的，與時下部分婦女運動者的主張有異。對許多人來說，女子職業自由與經濟獨立是非常實際的先決問題，直接關係到婦女解放的成敗。例如浙江上虞女校的讀者胡仰莫投書，就直陳女子職業範圍的狹隘，使女子經濟不能獨立，「事事為人挾持，為人箝制，雖要談解放，談改造，無非都是些空話」。[52] 舊式社會大家庭中的婦女，也常被新知識分子形容為「寄生」，批評她們不事生產且缺乏獨立謀生能力，阻礙婦女解放的進程。不少人從以上層面著眼，推廣職業教育。[53] 章錫琛和周建人便承認，「近來大多數人的意見」以為，婦女教育的目的「應該注重在職業教育，務使一般婦女受了教育後，都有自謀生活的能力」。然而他們引述晶子的話，認為將賢妻良母教育改為職業教育，也不過是「把低級奴隸變為高等奴隸罷了」。[54] 雖然章、周肯定經濟獨立的重要，贊成女子職業，但總歸認為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教育還是需

---

52 女子胡仰莫，〈一箇婦女問題的先決問題——擴張婦女職業的領域〉，《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2（1923 年 2 月），頁 55。

53 關於女子職業與謀生問題，早自梁啟超〈論女學〉就批評中國女子「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之弊，迄民初有志之士論述多延續此一思路。《婦女雜誌》也不乏持類似論調宣揚職業教育的文章，例如村士，〈普及女子蠶業教育之意見〉，《婦女雜誌》（上海），卷 5 號 1（1919 年 1 月），頁 1-8；韶先，〈女子職業教育之必要〉，《婦女雜誌》（上海），卷 7 號 10（1921 年 10 月），頁 105-106。

54 記者，〈我們今後的態度〉，《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頁 5。

以發展一般人類的本能為宗旨。

晶子對於家族制度、重男輕女等問題尖銳深刻的觀察，雖然批評的是日本的情況，但深得婦女問題研究會同人的共鳴，被認為能適用中國之局面。婦女問題研究會在 1926 年出版《與謝野晶子論文集》，收集晶子以貞操、戀愛、婚姻與教育等女性問題相關的文章，其中有許多曾在《新青年》、《婦女雜誌》與《婦女週報》等刊物上登載過，也包括上述二篇〈女子的自修自學〉和〈女子與高等教育〉。該書主要由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的教員張嫻負責翻譯，吳覺農、章錫琛分別幫忙指導與校訂。[55] 張嫻還鄭重去信請晶子寫序，讓原本不知作品已在中國流傳的晶子十分驚喜，致贈了序文與照片乙張（見圖 3）以供刊登。晶子在序文中謙虛表示，自己「稚拙的感想」能藉由翻譯被中國青年所閱讀，「是我所喜歡的」，並祈望「依了這譯文的廣被閱讀，對於中日兩國的親善有幾分的貢獻」。有趣且諷刺的是，晶子最後卻提醒：「我更深望貴國的青年，不要太偏於急激狂躁的改革，且應該愛重一點三千年來高貴而且美麗的古典的傳統」。[56] 這個叮嚀，對比五四以來新文化知識分子所高舉反傳統的激烈改革主張，顯示即便是被章錫琛等人奉為進步思想代表的晶子，與其擁護者仍然有立場上些微的差異。

---

55 與謝野晶子著，張嫻譯，《與謝野晶子論文集》（上海：婦女問題研究會、開明書店，1929），頁 i-ii。關於與謝野晶子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參見張競，〈与謝野晶子と中国——1920 年代前半に翻訳された評論について〉，《明治大学教養論集》，號 338（2000 年 9 月），頁 1-22。

56 與謝野晶子著，張嫻譯，《與謝野晶子論文集》，頁 iv-v。

圖 3：與謝野晶子寄贈張嫻的照片

說明：與謝野晶子（前排左）應張嫻的邀請，寄贈照片和序文，一同刊載於婦女問題研究會出版的《與謝野晶子論文集》。影像由本文作者翻攝。

## 三、周作人的科學常識體系

章錫琛與周建人雖然屢屢談到「人的教育」，但究竟其中該有什麼具體的內容，卻沒有完整申論過。他們基於將戀愛與生殖神聖化的理念，認為性知識的缺乏是性道德頹廢的主因，因此提倡性教育，不厭其煩地再三闡述性知識的重

要。[57] 然而除此之外，並沒有多談還有哪些領域的知識也重要。被章和周奉為圭臬的晶子，雖然曾進一步闡發「人間必要的教育」，包含愛的教育、知識教育與藝術教育等大類，並在知識教育方面，鼓勵女子「汎讀各部門」書籍後依個人興趣「選擇幾門來研究」，但也僅列出「所謂物理學的、化學的、經濟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等，各有許多立足點不同之見解的」這樣籠統的名目，[58] 而沒有繼續申論細節。[59]

在《婦女雜誌》上最早提出一套完整體系的常識教育論述者，是周建人的二哥，時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的周作人。周作人讀書的龐雜，在民初學者中是有名的。不但自己在回憶錄中爬梳其生平「雜學」的緣由，後世研究者也評論其對神話學、民俗學、性心理學與兒童文學等「中國傳統讀書人看不起的學問」廣博的涉獵，對五四時期新思想的刺激與新

57 例如「家庭中的性教育」系列開頭的編者序，以及此系列內包括周建人的文章，見周建人，〈性教育與家庭關係的重要〉，《婦女雜誌》（上海），卷 8 號 9（1922 年 9 月），頁 2-5。關於章錫琛在戀愛與性道德方面長期的觀點，見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

58 與謝野晶子著，無競譯，〈女子的自修自學〉，《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6，頁 1006-1007。

59 另外，晶子在《女人創造》中的〈女子の讀書〉也曾列舉不少具體的推薦書目與作者名單，並以自身為例指出「文學、美術、經濟、政治、史學、教育、哲學、婦人問題、勞働問題、國際聯盟問題、支那問題、社會改良問題、衛生問題」這 13 種她目前決定涉獵的科目。但是晶子同樣未詳細論述個別科目的綱要，這 13 種科目也不是科學領域的分類。見與謝野晶子，《女人創造》，頁 208。筆者以為，晶子雖然提出「人間性的教育」的宗旨與理念，但並未著墨這種教育該如何體制化去實際執行。

學科的創立有諸多啟發。[60] 留學日本(1906-1911)的生活經驗，對周作人的學思影響很大；旅日時他便注意晶子的著作，回國後還持續訂購新出版的相關書刊，對晶子在文壇的動態非常瞭解，在婦女解放思想方面受晶子影響甚深。[61] 周作人也是介紹晶子給中文讀者的先鋒，1918 年在《新青年》上翻譯晶子的〈貞操論〉，稱讚其為「現今日本第一女流批評家」。[62]〈貞操論〉是晶子作品的首篇中文譯作，引起了胡適與魯迅(1881-1936) 的回應，討論傳統禮教下女子貞操道德的合理性，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論述上具有開風氣的意義。章錫琛與周建人對晶子的關注，很可能是由於周作人推薦。周作人在《婦女雜誌》上論常識的文章，雖然沒有提到晶子，但可以推斷他對晶子「人間性的教育」的主張必有所聞，在以個人獨立人格為本位的教育立場上相當契合。

周作人的文章〈婦女運動與常識〉發表在 1923 年元月的「婦女運動號」裡。章錫琛籌畫這期專號已久，將近半年前就在雜誌上大張旗鼓徵文；在連續前二期的預告上，洋洋灑灑列出 30 多篇已定稿目，[63] 卻沒有出現周作人之名。或

---

60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下冊，頁 807-855；黃喬生，〈選編後記〉，收入姜德明編，《周作人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 345。

61 王妍妍、夏藝，〈與謝野晶子與周作人婦女解放思想之關係〉，《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5 年第 7 期，頁 73-88。關於日本文化對周作人學思生涯的廣泛影響，參見劉軍，《日本文化視域中的周作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62 與謝野晶子著，周作人譯，〈貞操論〉，《新青年》（上海），卷 4 號 5（1918 年 5 月），頁 386-394。

63 這 30 多篇稿目的作者（或譯者）群除了章錫琛與周建人以各種筆名

許這篇文章是臨時才決定脫稿，然而在目次中排在正文的第二位，僅次於主編自己的文章，可見章錫琛對周作人的重視。周作人開宗明義直率地批評：「現在的中國人民，不問男女，都是一樣的缺乏常識」，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智識階級，也是「有偏重一面的專門學問，但是沒有融會全體的普通智識」。他認為若是缺乏常識，婦女運動不容易開花結果，因為「大家都做著人，卻幾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為是『萬物之靈』的人，卻忘記了自己仍是一個生物。在這樣的社會裏，決不會發生真的自己解放運動的」。[64] 因此他引用古希臘哲學家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 c. 624-546 BC)的格言「知道你自己」，主張常識便是「使人們『知道你自己』的工具」：

> 平常說起常識，總以為就是所謂實用主義的教育家所提倡的那些東西，如寫契據或看假洋錢之類，若是關於女子的那一定是做蛋糕和繡眼鏡袋了。我的意思卻是截不相同。女子學做蛋糕原來也是好的，（其實男子也正不妨學做，）但只會做蛋糕等事不能就說是盡了做人的能事了，因為要正經的做人，還有許多事情應該知道。倘若不然，那麼只能無意識的依著本能和

發表之外，尚包括陳德徵、倪文宙、吳覺農、沈雁冰、張梓生、祁森煥等人。他們大部分是婦女問題研究會的發起人或會員，也是章錫琛時期《婦女雜誌》常見的撰稿者。「婦女運動號」內容涵蓋婦女運動的理論介紹與發展史，以及中國、歐美（英美法德）、俄國、日本、埃及與印度等國的婦女運動現況。見〈「婦女運動號」出版預告〉，《婦女雜誌》（上海），卷 8 號 12（1922 年 12 月），無頁碼。

64 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1，頁 8。

習慣過活，決不會有對於充實的生活的要求了。[65]

周作人接著便列出他認為必要的五組常識，包括「關於個人者」、「關於人類及生物者」、「關於自然現象者」、「關於科學基本者」，以及「創造的藝術」。前三組歸納為「具體的科學」；第四組則為「抽象的科學」。每種分組下還有細部的科目，大致可劃分成理論與實際二種（見表 1）。他自嘲這一大篇帳「彷彿是想把百科知識硬裝到腦裏去」，但也辯護其本意是「與中學課程的意思相同」，卻不限於學校功課，而是重在活用。

這個分類系統具體而微地顯示周作人的科學觀。他沒有明確指出，這樣的分組是否代表學習上的先後順序，也沒有說明是否反映了學科領域的上下階層或同心圓式由內向外擴展的組織關係。然而從第一組關於個人、第二組關於全體人類及生物，到第三組關於自然現象，我們可以看出不同類別的知識仍有親疏遠近的差別。第一組知識以個人身心為主，並標註需「特別注重性的知識」。周作人以為這樣安排的道理不證自明，可以「無需再加說明」，何況其弟周建人和章錫琛已經在雜誌中反覆闡述了。第二組知識是生物與人類全體，包括生物學與社會學。生物學包含普通的動植物學及體質人類學，是「敘述生物共通的生活規則」，特別注意進化及遺傳諸學說。社會學則是「人類文化的研究」，總括廣義的人類學與民俗學，凡「宗教道德制度技術一切的發達變遷都歸納在內」，而歷史則為「其專事紀錄者」。周作人

65 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1，頁 8-11，引句出自頁 8，表見頁 10。

以為「以上兩組的知識最為切要」，因為與人類關係至為密切：

表 1：周作人的常識綱要

| | |
|---|---|
| A 具體的科學 | |
| ○第一組　關於個人者 | |
| 甲　理論的 | 乙　實際的 |
| 一、人身生理<br>特別注重性的知識 | 一、醫學大意 |
| 二、心理學 | 二、教育 |
| ○第二組　關於人類及生物者 | |
| 甲 | 乙 |
| 一、生物學<br>進化論遺傳論 | 一、善種學 |
| 二、社會學<br>文化達發史 | 二、社會科學 |
| 三、歷史 | |
| ○第三組　關於自然現象者 | |
| 甲 | 乙 |
| 一、天文 | 實業大要 |
| 二、地學 | |
| 三、物理 | |
| 四、化學 | |
| B 抽象的科學 | |
| ○第四組　關於科學基本者 | |
| 一、數學 | |
| 二、哲學 | |
| C 創造的藝術 | |
| ○第五組 | |
| 甲 | 乙 |
| 一、藝術概論 | 一、文藝 |

| | |
|---|---|
| 二、藝術史 | 二、美術<br>三、音樂 |

說明：本表格按周作人原作整理，文字、數字與符碼悉照原作。

> 要想解決切身的重要問題，都非有這些知識做根柢不可。譬如有了性的知識，可以免去許多關於性的黑暗和過失；有了文化史的知識，知道道德變遷的陳跡，便不會迷信天經地義，把一時代的習慣當作萬古不變的真理了。所以有人生的常識中，這兩組可以算是基本的知識。[66]

藉由窺見歷史發展而明白文化變遷，進而培養獨立判斷的理性與勇氣，突破傳統禮教的束縛，可說是周作人的核心教育理念。在另一篇發表於《婦女週報》的文章〈女子的讀書〉中，他再度闡述這點，認為生物學、人類學與文化史這些「具體的說明自然與人生的科學書」，是對於達成這個理想最有益的書籍。[67]

周作人沒有著墨說明第三組「關於自然現象者」與第四組「關於科學基本者」，只有把以上四組合稱為「科學知識」。他認為科學知識的用處，是讓人了解本身及與本身有關的一切自然界現象，才能使人憑獨立判斷去造成自己的意見。不過他特別說明第五組知識是藝術，不屬於科學，「特別成為

66 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1，頁 10。

67 周作人，〈女子的讀書〉，收入周作人著，鍾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 3 卷，頁 319。原載《婦女週報》（上海），期 22（1924 年 1 月 16 日）。

一部」，好處不在理智上而是情感上。他指出可能有人疑惑藝術未必是常識，但藝術( 包括文學 )也與人生有切身關係，因為「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們的現代生活裏是極重要的一部分」。最後周作人又批評說，最近雖然中國婦女運動的聲浪高了，但依然有「頑固的反動」以為「女子是天生下來專做蛋糕的」：

> 我也承認運動解放的女子裏有多數還未確實的自覺，但對於那些家政萬能的學者更要表示不滿。究竟他們是否多少了解自己，還是很大的疑問，更不必說知道女子了。我不知道他們根據什麼……便斷定女子只應做蛋糕，尤其不懂有什麼權利要求女子給他們做蛋糕？……倘若以為這是日常生活裏的需要，各人都應知道，那麼也不必如此鄭重的提倡，也不能算作常識的項目，更不能當作人生的最高目的。我希望現在主持婦女運動的女子和反對婦女運動的男子都先去努力獲得常識，知道自己是什麼，人與自然是什麼，然後依了獨立的判斷實做下去，這纔會有功效。[68]

周作人這套知識分類系統與西方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頗有精神相通之處。相對於專業的、技術性的職業訓練，博雅教育的目的在於形塑整體的知識與性格，重視文史哲與基礎自然科學等通才素養的培育。[69] 雖然周作人還是

---

68 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1，頁 11。

69 西方「博雅教育」的傳統可追溯至古典時代的希臘，認為一位「自由人」在公民社會中生活須具備的技能。當然隨時代不同，博雅教育的內容也有不同定義，例如中世紀歐洲以「七藝」：文法、邏輯、修辭、

有在其體系內包括「實際的」科學，例如醫學、優生學（善種學）與實業大要，但他不以職業教育優先的理念，以及對「家政萬能」的學者表示的不滿，也呼應晶子提倡的「人間性的教育」。他的體系根植於人文主義，反映五四時期部分新文化人士所認知的「科學」究竟是什麼樣貌。周作人強調個人身心知識的優先，尤其是性的知識，這也是此時期《婦女雜誌》編輯群所提倡的戀愛自由、生殖神聖等理念，符合「人的教育」中以自我為出發點的基礎。[70]

周作人把人類社會與生物世界相提並論，特地標註進化論、遺傳論與「文化達發史」於常識綱要，也反映出當代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下，以生物演化的原理詮釋人類社會，所發展出的「社會文化進化論」(sociocultural evolution)。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的社會文化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是從野蠻進展至文明的單一路徑，其中過程可分成不同階段，學者則試圖尋找人類社會與歷史的科學通則。[71] 社會文化進化論將文明進程區分階段的概念及語彙，對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

算數、幾何、天文與音樂為代表。總的來說博雅教育相對職業教育，重視培育通才，不以養成技術專家為目標。中文世界裡分析西方大學傳統與博雅教育的代表著作，見金耀基，《大學之理念》（臺北：時報文化，2003 年修訂版）。

70 王汎森對於五四時期有關「自我」與「人」的意識變化有精闢的分析，見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 60-65、82-87。

71 John W. Burrow, *Evolution and Society: A Study in Victoria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Henrika Kuklick, *The Savage With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1885-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5-118.

分子來說並不陌生。例如當論述家族制度的歷史，署名晏始的作者就說：「〔家族制度〕實在是人類進步發展的過程上所必由的一段階級......不過歐美文明各國，現在已經越過了這段階級而跨在別一段的階級上，我國則尚在這階級上停留著；但同時還有比我國更未開化的民族，現在正停留在我國所已經越過的階級」。[72] 社會文化進化論是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領域早期發展的基礎。周作人很熟悉文化人類學的譜系，對人類學的興趣發展很早。他回憶清光緒丙午年（1906 年）便曾在上海入手一本由廣學會編印的英國人類學祖師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的入門書《人類學》（*Anthropology*, 1881 年初版），並提到不知何故廣學會改書名為進化論。他嘗言對人類學的興趣「大抵只是為了人」：「原是以文化之起源與發達為主。但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嚴幾道古雅的譯語所謂化中人位，我們也是很想知道的。那麼這條路略一拐彎，便又一直引到生物與進化那邊去了」。[73]

今日習慣的科學領域架構中，生物學——或者更廣義的生命科學(life science)——與物質科學(physical science)並列，同屬於自然科學。周作人卻將生物學與社會學、歷史學等與「人」有關的學科歸納成一組，放到比物質科學（即他分類的第三組）更優先的地位，可見其對社會文化進化論的

---

[72] 晏始，〈家族制度崩壞的趨勢〉，《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9（1923 年 9 月），頁 20。晏始也是章錫琛時期常為《婦女雜誌》撰稿的作者，可能為筆名，真實身分不詳。

[73]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頁 823-825，引句出自頁 825。

接納，以及對生物學的重視。

〈婦女運動與常識〉透露出周作人的科學觀，也能和五四時期眾人之見解互相對照。前面提過，「科玄論戰」是中國知識分子爭鳴「科學」詮釋的一場熱鬧盛事，正好也發生在 1923、1924 這二年間。綜觀他這二年內發表的文章，除了〈婦女運動與常識〉、〈女子的讀書〉之外，談到科學的作品不多。[74] 儘管周作人缺席科玄論戰，以他對達爾文演化論的熟悉與推崇，其立場某方面是接近「科學派」。例如「玄學派」鑑於歐戰對西方文明造成的破壞，反省科學的極限與負面影響，甚至有將歐戰歸咎於達爾文學說之盛行的說法。周作人便撰一短文為達爾文喊冤，開頭就諷刺：「中國人以達爾文為『這次歐戰』的禍首......今又經江南某教授證實，更是鐵案如山不可動了」。[75] 胡適提出科學的新人生觀，其中指出：「根據於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76] 也與周作人的常識綱領中特別注重人與生物相關的科學這點不謀而合。但是「科學派」以科學定於一尊的主張，又非周作人所認同。丁文江、胡適等人所謂的科學，是指基

---

74 筆者在此參考《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這段期間周作人少數談到科學的散文或譯文，除了本論文徵引的幾篇外，主要是與法國昆蟲學家法布耳(Jean-Henri Fabre，1823-1915)有關；周氏兄弟都很推崇法布耳的通俗科學作品。

75 周作人（署名荊生），〈冤哉達爾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頁 351。「江南某教授」不詳確指何人，不過「玄學派」主將張君勱、張東蓀當時皆任教於上海中國公學。

76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張君勱、丁文江等著，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頁 26。

於實驗主義求取事實，加以歸納、演繹以得證明與普世公例的科學方法，套句丁、胡皆說過的名言就是「拿證據來！」[77] 所以用科學方法求索的才能稱為知識，而一切知識皆入科學法門，如丁文江所謂「安因斯坦談相對論是科學，詹姆士講心理學是科學，梁任公講歷史研究法，胡適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78] 然而從〈婦女運動與常識〉可看出，周作人承認不屬於科學的「藝術」是重要的知識。周不認為科學應該佔教育的全部。雖然「教室裡的哲學的理論、科學的實驗，比以前的聖經賢傳、駢散詩文，當然好的多了」，但是他也批評上述教材，「於養成獨立判斷，發展理性勇氣的上面，其無力幾乎相等」。[79] 這種看法，又與「玄學派」張君勱主張科學以外尚有哲學、美術與宗教等不適用科學方法之知識，以及教育裡該增加使精神生活豐富的藝術訓練，[80] 有異曲同工之妙。

〈婦女運動與常識〉獲得讀者一片好評。《婦女雜誌》第 9 卷剛好開闢了一個「讀前號」欄，給讀者就前一兩期的內容投書心得短評。在第 9 卷第 3 號的 6 篇投書中，就有多達 4 篇稱讚周作人的文章。其中唯一的女性讀者陳麗貞，稱

---

77 見丁文江，〈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收入張君勱、丁文江等著，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頁 262-263；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科學與人生觀》，頁 14。關於科學派主張的科學方法，另參見嚴搏非，〈論「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理解〉，《五四：多元的反思》，頁 208-210。

78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科學與人生觀》，頁 34。

79 周作人，〈女子的讀書〉，《周作人散文全集》，頁 319。

80 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科學與人生觀》，頁 97-104、頁 117-118。

該文是她「最喜歡閱的」，因為能「指出近時婦女最缺乏的弊病......裨益我們的地方，實在不少」。[81] 另外 3 位男性讀者，包括當時 18 歲的青年嚴敦易(1905-1962)，[82] 讚揚〈婦女運動與常識〉很為切要，並以為《婦女雜誌》一向「很是偏於純理論」，希望「要對常識方面分些力來方好」。[83] 嚴敦易後來更發表專文，指出要促成一般婦女的覺醒，並救濟她們被埋沒的智能發展，最好的辦法是提供「淺顯完備的讀物」，將各種科學上、社會上的常識以淺明的文字介紹給她們，而且「周作人先生......列的一個表類，很可為這本書的編輯綱領」。[84] 另一位讀者許元啓(1899-1972)，[85] 雖然對周作人所謂「做蛋糕」那部分不苟同，仍然「極同意」該文，直指「目前病態，實因缺乏『整個』『和諧』的常識」。[86] 而讀者衛士生(1899-1990)甚至直言《婦女雜誌》的幾篇文字，

---

81 陳麗貞，〈讀前號〉，《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3（1923 年 3 月），頁 128。

82 嚴敦易，江蘇鎮江人，字易之，號渥甫。小學畢業後到銀行當練習生，後長期在財經機關工作，業餘從事文藝創作與小說戲曲研究。中共建政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參見婦女期刊作者研究平台，http://mhdb.mh.sinica.edu.tw/ACWP/author.php?no=562（2018 年 5 月 8 日檢索）。

83 嚴敦易，〈讀前號〉，《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3（1923 年 3 月），頁 128。

84 嚴敦易，〈現在婦女所急需的出版物〉，《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8（1923 年 8 月），頁 44。

85 許元啓，江蘇（今屬上海市）嘉定人，字啓民。五四時為唐山交通大學機械系學生，積極參與五四運動，1921 年畢業後任教上海交通大學，1923 年起參加由中共地下黨員組織的上海通訊圖書館。見楊于白編，《嘉定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 1129-1130。

86 許元啓，〈讀前號〉，《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3（1923 年 3 月），頁 128。

恐怕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都不見得看得懂。他認為培養婦女運動的常識比介紹國外婦女運動的譯著來得重要；有「先覺」的少數女同胞，需多求些「知道你自己的工具」來傳授給別人。[87]

從〈婦女運動與常識〉到章錫琛於 1925 年卸任主編職務為止，在《婦女雜誌》上申論過女子教育應該具備的科目者，還有向警予、蔣鳳子二人。她們的文章都提到並肯定周作人，列舉的綱目也不脫周所提出的框架，可見周這套體系在《婦女雜誌》相關人物圈內流行的影響力。向警予當時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主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報》，積極參與女權與勞工運動。就像章錫琛等人在社論〈我們今後的態度〉的意見一樣，她的文章也批評女子教育的陳舊與失敗，主張徹底改造教育方針、剷除女校裡的「老冬烘」，並一律廢絕特殊性的女校編制與課程。她認為「在養成獨立判斷和發展理性勇氣上面，周〔作人〕先生對於女子讀書的指導，可算很對」；但她嫌周的綱領在改造社會這目標上的應用不夠，故補充說女子的首要任務在於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明白「社會進化的歷史」及「政治經濟的關係」。她主張以先後緩急論，「社會科學的研究應在自然科學之前」，所以推薦女子對歷史學、社會學、社會進化史、經濟

87 衛士生，〈讀前號〉，《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3（1923 年 3 月），頁 128-129。衛士生，浙江衢縣人，1922 年畢業於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與共產黨人親善，抗戰時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擔任周恩來的英文翻譯。中共建政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見浙江省人物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人物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 874。

學、政治學、法律學、哲學都該有認識。[88]

蔣鳳子原為浙江台州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曾因不滿婚姻束縛阻絕前途，於 1918 年向法庭提出離婚訴訟，並在多份報刊發表其對婚姻與自由戀愛的看法。[89] 後來她未完成學業，跟隨抱有安那其主義(Anarchism)思想的男友張任天(1887-1995)搬到上海做紗廠女工，並藉由張任天與章錫琛的交情進入《婦女雜誌》的圈子，成為「婦女問題研究會」發起人之一。[90] 蔣鳳子常為這時候的《婦女雜誌》撰稿。在討論女子教育改革案時，她便先完整引用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的常識綱目，反問讀者有幾個女子中學合於上述條件？她以為女子教育要注意三個條件：第一，注意心身的法則；第二，注意家國的組織；第三，注意宇宙的現象。接著補充以上三條分別是自身的、及人的與及物的；另外在各條下，羅列了相關學科及具體的「宣傳」項目（見表 2）。[91] 蔣鳳子列的這三個條件，分別對應周作人體系的前三組，可見

---

88 向警予，〈中等以上女學生的讀書問題〉，《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3（1924 年 3 月），頁 450-453。

89 鳳子，〈我的離婚〉，《婦女雜誌》（上海），卷 8 號 4（1922 年 4 月），頁 143-145。

90 許傑口述，柯平憑撰，《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54-57。張任天，浙江仙居人，曾赴日本留學，參加過光復會、同盟會，服膺孫中山思想，曾撰書宣傳三民主義，亦曾在五四時期參加安那其主義的活動。當時張任天已有妻室，但與蔣鳳子自由戀愛。二人於 1925 年赴南洋遊歷，途經檳城、新加坡等埠，見〈青年勵志社請張任天先生蔣鳳子女士講演〉，《南洋商報》（新加坡），1926 年 7 月 3 日，頁 4。

91 鳳子，〈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1924 年 11 月），頁 1666-1667。

其大致上仍然不離周作人定義的範疇，惟學科稍有不同，比如說把生物學歸納為第一條「心身的法則」。她在「宣傳」方面的實際應用列舉得瑣碎，卻沒有說清楚這些細項與學科之間的關聯。

雖然向警予和蔣鳳子都讚賞周作人的常識綱領，但教育立場與周作人仍有差異。周作人秉持新文化運動初始以「人」為本的理念，特別保護尚未被成人世界污染的兒童。他曾明白表示自己對教育的希望是「把兒童養成一個正當的『人』」，但「現在的教育卻想把他做成一個忠順的國民」。他反對將政治上的意見引入小學教育，甚至批評說：「群眾運動有時在實際上無論怎樣重要，但對兒童的文學沒有什麼價值，不但無益而且還是有害」。[92] 和周作人相較，蔣鳳子與向警予雖然也宣揚獨立人格的重要，卻更強調知識在改造社會與政治運動上的實際應用，更加偏重社會科學在教育中的分量。這種細微的理念差異，與二人直接呼籲激進的教育與社會改革不無關係。身為中共黨員的向警予對革命的投入自不待言；蔣鳳子受張任天影響，也期望急速且徹底地改造社會。正如蔣鳳子在結論所言，「想在現代做個人樣的人，女樣的女麼！女子教育的革命！」這般慷慨激昂的呼籲，[93] 女子教育改革訴求激進化的趨勢已然明顯。

表 2：蔣鳳子的女子教育課程綱要

[92] 周作人，〈關於兒童的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頁 192-195。

[93] 鳳子，〈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頁 1675。

| | 條件 | 學科 | 宣傳 |
| --- | --- | --- | --- |
| 第一 | 注意心身的法則<br>（自身的） | 算學、論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生物學、善種學 | 只述其有關實用的一面，如論思的律令、產兒的制限 |
| 第二 | 注意家國的組織<br>（及人的） | 行為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 | 只述其有關戀愛問題、婚姻問題、職業問題、參政問題的實際應用，尤注意現在女子的地位 |
| 第三 | 注意宇宙的現象<br>（及物的） | 天學、地學、力學、質學 | 只述其在航海業、醫藥業、農業、礦業、鐵道業、郵電業、機織業、手工業及雜事勞動上的應用 |

說明：本表格按蔣鳳子原作整理。

## 四、交鋒：支持家事教育的異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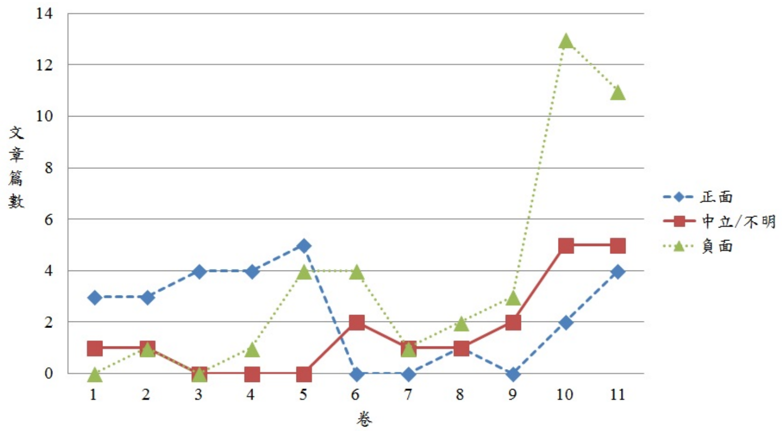
反對賢妻良母與家政教育的聲浪雖然在五四後成為《婦女雜誌》主流，仍然有讀者持不同意見。這些持異議的少數聲音，不見得是新派人士所謂守舊迂腐的「老冬烘」，其中大部分是為家政教育或家事實務的重要性辯護。事實上，章錫琛時期的《婦女雜誌》也不是一直緊咬著賢妻良母問題不放。圖 4 是統計 1915 至 1925 年之間，《婦女雜誌》提到「賢妻良母」或其相關概念如「天職」的科學、醫藥或教育類文章的態度趨勢。這個統計將文章對賢妻良母概念的評價分為

「正面」、「負面」、「中立或不明」三種態度。[94] 結果顯示，雖然五四的確是對賢妻良母的態度轉變明顯的分水嶺，《婦女雜誌》歷年的討論並不是維持一面倒的意見或熱度。章錫琛時期的前三年（1921-1923；即第 7-9 卷），其實不常討論賢妻良母問題，也少刊載相關的文章。這時候章錫琛絕大部份的精力投注在自由戀愛、離婚、貞操以及節育（產兒制限）等議題上，對賢妻良母與家政教育的批評呈現相對「沉寂」的狀況。這種關注題材時常變化的現象並不稀奇。前人研究已指出，章錫琛與周建人原本都不是婦女問題的專家，是在編輯雜誌的過程中認識婦女問題並摸索解決之道。[95] 與其說他們是領導風潮的先知，不如說他們善於捕捉潮流，藉由與讀者的互動來學習並影響輿論。

圖 4：《婦女雜誌》文章對賢妻良母態度的變化(1915-1925)

94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使用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雜誌》資料庫沒有全文檢索功能，因此本統計靠人工瀏覽蒐集樣本，並不一定完整，但仍足以呈現相當程度的趨勢。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雜誌》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fnzz/（2018 年 12 月 18 日檢索）。

95 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頁 13-14、18。




說明：本圖由作者整理。統計樣本包括《婦女雜誌》從第 1 卷(1915)至第 11 卷(1925)提到「賢妻良母」及「天職」、「母職」等相關詞彙，且內容涉及科學的文章。作者依其文意將該文對賢妻良母的態度區分為「正面」、「負面」、「中立或不明」。為免冗贅，各文章不一一列表，僅列舉第 10 卷(1924)為例，參見表 3。

賢妻良母問題重回《婦女雜誌》編輯群的視野，成為眾人爭辯的焦點，是發生在 1924 年（第 10 卷）。圖 4 顯示，提到賢妻良母的文章在這一年內就遽增至 20 篇，達到前三卷數量總和的一倍（見表 3）。這一年章錫琛關注女子職業與教育問題，不但刊載大量相關文章，也安排多次討論機會。這些努力包括開闢「職業問題號」（第 10 卷第 6 號），以及分別採用「職業與家事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與「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作為「討論會」欄的徵文題目。另一方面，除了章錫琛本身的興趣之外，這一年也有外部因素刺激《婦女雜誌》同人回應賢妻良母問題。

表 3：《婦女雜誌》第 10 卷(1924)文章對「賢妻良母」的態度

| 號 | 作者 | 標　　題 | 態度 |
|---|---|---|---|
| 1 | 記者 | 我們今後的態度 | ╳ |
| 2 | 屠哲隱 | 賢妻良母的正義 ── 為「賢妻良母」四字辯護 | ○ |
|  | 光義 | 良妻賢母主義的不通 | ╳ |
| 3 | 日本與謝野晶子著、張嫻譯 | 給聰明的男子們 | ╳ |
| 4 | 何覺余女士 | 婦女運動的錯路及正軌 | ╳ |
| 5 | 劉巍 | 〔通訊〕（四十七） | △ |
| 6 | 健孟 | 婦女職業的先決問題 | ╳ |
|  | 黃石 | 婦女果不適於職業麼 | ╳ |
| 7 | 谷萬川、章錫琛 | 〔通訊〕（五十） | ╳ |
|  | 任白濤譯 | 女子教育之科學的根據 | ╳ |
| 8 | 惕文 | 異哉現代的良妻賢母主義 | ╳ |
| 9 |  | 生活理想與理想生活 | ╳ |
|  | 獨素 | 〔職業與家事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六 | △ |
| 10 | 宗樹男 | 〔我所希望於女子者〕七 | ○ |
|  | 吳隼 | 〔我所希望於女子者〕九 | △ |
|  | 景初 | 〔尊重女性的男子是否可與不滿意的舊式妻子離婚〕六 | △ |
| 11 |  | 齊家與女子 | ╳ |
|  |  | 女子教育是什麼 | ╳ |
|  | 鳳子 | 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 | ╳ |
|  | 徐寶山 | 〔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六 | △ |

說明：本表格由作者整理。符號分別表示：╳（負面）、○（正面）、△（中立或意見不明）。

1924 年教育部官方的訓令是刺激賢妻良母議題白熱化的重要導火線。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女子中學自秋季始業起，注重家事實習。其原文表示：

……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必以齊家為先。蓋家為國家

> 與社會之根本，其良窳如何，影響至巨。然求良善之家庭，必自研究家事始。查近日各女校對於家事科，但就教科書尋文擇義，於事實難見實效。茲據北京高等女師範所擬實習家事案，經本部詳加審核，所擬各節，不無可採。相應抄錄原案，令仰知照，俾資參考實習。限自本年秋季始施行。[96]

教育部並附錄北京女高師的原案，指出家事實習必要的設備，例如烹飪室應備中西式爐灶及一切烹飪用具，膳堂也要分中式與西式，另外還需設置兒童保育室，陳列兒童玩具、衣服與禮儀演習圖等。除了教育部的訓令外，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 10 屆年會的決議也有「女子學校應特別注重家事實習案」。[97]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教聯會）由各省推派代表組成，每年集會討論教育議題，從新學制、職業教育、義務教育等政策規劃，到處置外國退還之庚子賠款等實際問題，「靡不由該會研究討論，建議於政府及各省教育機關，采擇施行」。[98] 雖然它的決議沒有法律強制性，但能供政府諮詢並實施，可見其重要性，也相當程度反映出教育界決策菁英的意見。1924 年的第 10 屆年會是在河南開封舉行，由於正逢直奉軍閥內戰，會議延期至 10 月 15 日方召開。

---

96 〈女學校注意家事科〉，《教育雜誌》（上海），卷 16 號 10（1924 年 10 月），頁 9。

97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十屆年會概略〉，《教育雜誌》（上海），卷 16 號 12（1924 年 12 月），頁 1-9；女子學校家事實習案為決議的第十四項，見該文頁 4。

98 〈行將開幕之全國教聯會〉，《教育雜誌》（上海），卷 16 號 10（1924 年 10 月），頁 4。

原擬包含 23 省區 60 名以上的代表赴會，最後也僅有 14 省區代表 35 人出席，通過決議案 46 條。關於女校應注重家事實習一案，教聯會附和教育部意見，認為目前「女生對於家事一科，往往視為故事，日常之勞動事務，既多不屑為……迨畢業之後，所學既不適用，婦職又不能修」，因此「非使之特別注重家事不為功」。[99] 決議列舉辦法數條，包括女學生需親自負責烹飪、縫紉、洗衣及宿舍灑掃等勞動工作；切實練習家庭衛生與簿記；各級女子師範學校並需特別注意培育家事教員。

對章錫琛等進步人士而言，以上訓令與議案不啻代表保守陣營的刻意挑釁。《婦女雜誌》當年 11 月號的「主張與批評」欄中，便刊載二篇評論分別反駁教育部訓令與教聯會議案。[100] 在〈齊家與女子〉一文中，《婦女雜誌》編輯對教育部的訓令質疑：「衹是研究了一點……中西烹飪法等等的家事，是否便能合於古人所謂齊家的意義，使家庭完全成為良善？」另外也質疑，齊家、治國與平天下的責任由男女共負，家事不僅女子所應研究，何以教育部卻只訓令女子中學？由此推論，這份訓令的目的，「無非想使女子負家庭服務的專責，使男子得以幹治平的事業」。最後總結：

---

99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十屆年會概略〉，《教育雜誌》（上海），卷 16 號 12，頁 4。

100 〈齊家與女子〉，《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1924 年 11 月），頁 1654-1655，以下引文出自頁 1655；〈女子教育是什麼〉，《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1924 年 11 月），頁 1659-1660。本年的「主張與批評」欄諸文一律未署名，然而後期開始署名後，常見周建人為作者，可見此欄可視為編輯部社論的延伸。

> 我們並不以為女子可以不必知道一點家事，齊家的責任完全應該擱在男子肩上。但我們以為所謂齊家，決不是僅僅幹一點陳列家具、烹飪中西餐、保育、縫紉、洗濯、種花等瑣事所能完全包括，至少對於家庭的如何建設，不可不有根本的理解。……現在的社會，把女子當作男子的附屬物，甚至當做男子的器具，不但說不到她們身心的脩正與否，簡直可說並不曾有所謂身心。使這樣沒有身心的女子當那齊家的重任，縱使客堂陳設得怎樣華美，肴饌烹調得怎樣可口，家的決沒有齊的希望，乃是我們所敢斷言的。

另一篇〈女子教育是什麼〉，則批評教聯會，主張在近代趨勢下，「家事不當再認為女子教育的中心目的」。論者以為，雖然許多女子在烹飪、縫紉等技藝方面不如專門工匠，然而「不失她們的社會價值」，因為「她們能運用科學知識，有明晰的思想，由教育給予更大的生存能力」。論者更進一步引用社會進化的原理，認為「家庭的社會化是必然的趨勢」，社會分工使得家庭事務演變成交付專職人員來處理。所以女子為了養育子女、研究學問，或「任一切社會事業和社會改革運動」，無暇及於家事時，都不妨「喫包飯，衣服拿到裁縫店去做，洗衣作裏去洗的......畢竟另外有著比這更重要的事情應該〔使她們〕知道和學習」。[101]

除了以上二篇代表雜誌編輯部的評論，其他抨擊賢妻良母或家事教育的文章在這一卷也相當激烈。例如〈異哉現代的良妻賢母主義〉一文，便攻訐「以永久充當家庭奴隸，而

101 〈女子教育是什麼〉，《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頁 1660。

以養育子女為附帶條件」的賢妻良母主義是「根本蔑視社會進化的獨斷主張」，「毒害人類幸福不淺」。[102] 又如蔣鳳子也指責阻礙女子教育的敵人，「一方面限制我們女子活動的範圍，一方面假冒科學的招牌」，前者是「設立女校以後的賢妻良母主義」，後者是「各大學的不准女子入校和各女校的放低課程標準」，[103] 也就是男女有別、專治家政的女子教育體制。在《婦女雜誌》之外的報刊，對教育部與教聯會的批評聲浪也不絕，尤其是反對北京政府的國民黨機關報。例如《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報》的社評，便諷刺教聯會諸公「何不把全國的女學校，一律改成家事專修學校呢？......何不提議將全國女學校一律停辦，使所有女子全在家庭中學習家事呢？」[104]

即使在反傳統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婦女雜誌》上仍然有少數為賢妻良母與家政教育辯護的聲音。這些作者自然不屬於婦女問題研究會的圈子，大多是藉由投書或徵文來陳述意見。編輯部外人士的來稿通常刊登在「自由論壇」欄，其中就有些與編輯部立場相左的文章。例如屠哲隱的文章標題便直接表明「為『賢妻良母』四字辯護」。屠哲隱指出，新文化運動原是好現象，「自己也額手稱慶的」，但其中「不免有瞎倡盲從的人」，以為「現在是解放時代，什麼都可打

---

102 惕文，〈異哉現代的良妻賢母主義〉，《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8（1924 年 8 月），頁 1239。

103 鳳子，〈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11，頁 1664。

104 悉明，〈社評（一）〉，《婦女週報》（上海），期 61（1924 年 11 月 5 日），頁 2-3。

破，於是將中國數千年來的名教禮綱，不問好歹，一概反對」。他反駁「賢妻良母」就是「從夫從子」、「終身做男子的奴隸」這種見解，認為賢妻治內共建優美的家庭，良母教子俾成有用的國民。尤其培養健全兒童的「良母」，正是中國當今亟需的「大好的國民份子」。他主張賢妻良母也是女權的重要部分，而英美的婦女運動者「多是經過『賢妻良母』的路程，她們善治『家政』，所以也要兼顧『國政』」。[105] 屠哲隱的論述，基本上承襲自清末流行的「國民之母」概念，是梁啟超等清末啟蒙志士常見的話語，也符合早期婦女運動菁英諸如胡彬夏等人的思想。[106] 屠哲隱的申論由賢妻良母上綱到國民、治國的層級，然而更多人提出的異議，是著眼於基層家事實務的重要。例如另一位讀者柏楊以為，盡力於家庭也等於盡力於一種社會事業：

> 我對於〔女子〕獨立解放種種主張，是很贊成的；不過近來有一種人，說女子既有社交的機會，就要到社會上去做事，不該再做家庭裏奴隸式的烹飪、縫紉，……這種見解，不免有些錯誤。廣義的社會，家庭也在其內；所以盡力家庭，一定也是社會事業的一種，說他不是盡力社會，是萬萬不可能的。那麼，烹飪、縫紉，……育兒種種的社會事業，何得說他是奴

105 屠哲隱，〈賢妻良母的正義——為「賢妻良母」四字辯護〉，《婦女雜誌》（上海），卷 10 號 2（1924 年 2 月），頁 363-365。

106 有關「國民之母」概念及晚清以來塑造國民意識的努力，見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24-29；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4 分（2002 年 12 月），頁 717-723。

> 隸式呢？不過不做這種事情，而做社會上其餘的事情，也可以的，其為效力於社會，同家事一樣，毫沒有高下的。假使能力適於家事方面，棄之而不屑做，旁的事情，又不能做，或非個性所近；於是遊手好閑，終天無事，那麼，名為促進社會改造社會的一分子，其實無異於社會的蠹蟲了。[107]

另外當徵文討論職業與家事何者適合女性，以及男女應否受同樣教育時，也不乏有讀者投稿主張女性適合家事，或男女性情不同而不宜受同樣教育的意見。[108] 由此可知，章錫琛時期的《婦女雜誌》雖然成為主張激進改革的進步人士的大本營，但不是輿論一面倒的「一言堂」，同五四時期許多刊物一樣呈現新舊交鋒的痕跡。儘管如此，雙方的論點往往沒有交集，光是對做家事是否就算「奴隸」便各執一辭，最終只能停留在各言其志的原點。

## 結　論

五四時期在反傳統的浪潮下，中國知識分子興起以「人」為本位思索的價值觀。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處處強調人的覺醒、人的解放等打破傳統習俗束縛的新觀念。這

---

107 柏楊，〈對於女子解放的私議〉，《婦女雜誌》（上海），卷 9 號 5（1923 年 5 月），頁 27。

108 例如在第 10 卷第 11 號「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徵文中，刊登的 10 篇文章有 4 篇主張男女不該受同樣教育；而第 10 卷第 9 號「職業與家事那一種更適宜於女子」徵文，7 篇文章中有 3 篇認為女子更適合家事，由此可一窺其正反比例。

種個人主義或人文主義式的思潮也擴及到女子教育，進步人士批評當時體制內盛行的賢妻良母思想，以及男女有別的教育實踐，期望進行全面的改革。以章錫琛、周建人為代表的《婦女雜誌》，便是 1920 年代前半葉倡導激進改革理念的推手。《婦女雜誌》同人從日本作家與謝野晶子的著作汲取思想資源，提倡「人的教育」，反對賢妻良母宗旨對女子教育與事業生涯的束縛。然而當代改革女子教育的意見紛紜，即使是「新派」人物，理念上也多分歧，很難以單純的新舊之爭來簡單劃分。

對輿論觀察力敏銳的章錫琛和周建人，其實也注意到這些細微的理念差異。1925 年 6 月，在章錫琛《婦女雜誌》主編生涯尾聲出刊的「女學生號」，兩人分別總結對當今女子教育界的看法。其中周建人就指出，固然「三家村學究」說「男子治外，女子治內」是天經地義，連「新式教育家」也不疑心這「自然的分工」，認為學習治理家務是女子教育重要的內容。[109] 章錫琛則將信奉賢妻良母主義者稱為「實用派」，認為這些「方正的道學家」志在養成女學生為服從而「供男子實用的奴隸」。他把新派教育家區分為「職業派」與「事業派」：前者將求學視為職業的準備，以自謀生活為教育目標；後者則積極從事各種運動，謀社會群體的福利。他自然不認為實用派的觀念正確，也批評職業派「有偏缺」，不能培養出「完全的人」，而事業派的意見雖然「更有很大的價值」，卻可能因此犧牲學業。章錫琛以為不論男女，學

---

109　周建人，〈女子教育與女學生〉，《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6（1925 年 6 月），頁 870-871。

生最要緊的任務是「把身心發達到最完全的狀態，使將來能夠成為一個在社會上嶄然獨立的人」。[110] 從男女平等的立場出發，以培養獨立人格為目標，是「人的教育」的核心理念，也顯示受新文化運動以「人」為本位的思潮的影響。

周作人獲得廣大迴響的文章〈婦女運動與常識〉，便需要放在這段「人的教育」與「賢妻良母」理念之爭的脈絡下來檢視。周作人的常識一文雖然未提及晶子與她的教育理念，但在教導「做人」的精神上，可說和晶子「人間性的教育」一貫相通。以周作人對晶子作品的熟悉以及與婦女問題研究會的密切關係，或許正是他引介晶子的思想給《婦女雜誌》同人，啟發後來〈我們今後的態度〉這篇社論的宣示，以及眾多作者頻繁的討論。

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在文內提出一套完整的常識綱領，提供我們一個檢視 20 世紀初新文化人士知識觀的絕佳樣本。周作人的科學體系相當具有新文化運動初期思想以「人」為主體的特色，首先以個人身心知識——生理學、心理學與性教育——為根本，再擴及到以生物學與社會學為主的關於人類全體的知識，以及自然現象的物質科學，呈現一種層遞的知識脈絡。在上述具體的科學知識之外，又加上抽象的數學、哲學與創造性的藝術。周作人將生物學與人類社會文化相提並論的作法，尤其是對演化與遺傳學說的強調，反映出當時在西方與中國皆普遍流行的社會文化進化論思維。周作人這套乍看像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架構，對隨後提倡「人的教

110 章錫琛，〈女學生的人生觀〉，《婦女雜誌》（上海），卷 11 號 6（1925 年 6 月），頁 864-866。

育」的《婦女雜誌》同人而言，囊括了無論女子或男子，作為一個獨立的「人」都必須知道的科學常識。在這套體系內，周作人揶揄的「做蛋糕」一類家政知識毫無立足之地。儘管家政教育是當時體制內女子教育的主流，無論政府主事者、基層學校的教員，甚至部分放洋留學的新式教育家都十分重視，體制外的改革者卻亟欲推翻這種「反進化」的「奴隸」教育。

1920 年代前半葉《婦女雜誌》的女子教育之爭，除了本文著墨的「人的教育」挑戰「賢妻良母」理念的角度，也有其他值得延伸思考的方向。首先是關於何謂「實用」的定義。無論是家政教育或職業教育，在目的上或實際訓練上都重視實作的層面，期望培養對家庭、對謀生所需要的有用技藝。然而這種功利性質明顯的取向，恰是被章錫琛等人批評為奴隸化、機械化。雖然「人的教育」支持者極端排斥這些「有偏缺」的教育模式，卻不代表他們完全不重「實用」，而是他們對何謂「實用」的定義有所不同。依進步人士之見，對女子有用的知識不是傳統認知的縫紉烹飪、種桑養蠶等等可用來治家的實作技藝，而是可應用於改造社會的社會科學，以及與人類進化繁衍相關的性知識及遺傳學、優生學。甚至如前面提到的社論〈女子教育是什麼〉所預言，社會進化必然造成傳統的家庭分工轉型，變為由專職人員來處理家庭事務。既然新女子不需要再侷限於家庭的框架，原本有用的知識自然也變得「無用」了。這些見解顯示，儘管「人的教育」支持者經常從男女平等、人格獨立脈絡來立論，他們的理想不只是個人主義式的解放，也反映出更宏大地改造既有家庭

或社會型態的藍圖。

其次，《婦女雜誌》在 1924 年以後加劇對賢妻良母主義的鬥爭，除了教育與家庭理念的差異，也反映了五四時期尾聲從思想文化啟蒙轉向政治運動的潮流。不少前輩學者皆指出，新文化運動到了 1924 至 1925 年已成強弩之末，從初始注重個人主義的啟蒙，變質成訴求主義化、組織化動員社會的革命行動。[111] 國民黨的改組與此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象徵新型態政黨的崛起，吸引不少五四世代深受啟蒙思想洗禮又對時局失望，進而寄望積極政治行動的「覺醒」青年投入。這種學生運動與政治的轉向，由《婦女雜誌》此時期激化的言論來看可謂一葉知秋。從《婦女雜誌》對教育部及全國教聯會家事實習案的反應可知，1924 年進步人士對賢妻良母問題擴大批評，是由於保守陣營與教育體制主事者刺激的結果。而這股風潮是否也牽連隨後在 1925 年升高的各種政治衝突，例如著名的北京女師大學潮？五四時期尾聲凸顯的「賢妻良母」與「人的教育」之爭，在教育理念與婦女問題思辨啟蒙的表面之下，或許也隱伏著未來政治黨爭的暗流。

111 呂芳上，〈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207-232；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4（2013 年 6 月），頁 3-88。關於 1920 年代學生運動的發展，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其中北京女師大學潮牽連的政治因素，見頁 222-240。

# 徵引書目

## 一、報刊

《文化生活研究》（東京），1920-1921。
《南洋商報》（新加坡），1926。
《國聞週報》（上海），1926。
《婦女週報》（上海），1924。
《婦女雜誌》（上海），1915-1925。
《教育雜誌》（上海），1919-1924。
《新青年》（上海），1916-1918。

## 二、專書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1994]。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
周作人著，鍾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周策縱著，楊墨夫編譯，《五四運動史》。臺北：龍田出版社，

1980。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臺北：時報文化，2003 年修訂版。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上、中冊。臺北：國史館，1985-1986。
浙江省人物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人物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張君勱、丁文江等著，汪孟鄒編，《科學與人生觀》。臺北：問學出版社，1977。
許傑口述，柯平憑撰，《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楊于白編，《嘉定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與謝野晶子，《女人創造》。東京：白水社，1920。
與謝野晶子著，張嫻譯，《與謝野晶子論文集》。上海：婦女問題研究會、開明書店，1929。
劉軍，《日本文化視域中的周作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Bailey, Paul.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Burrow, John Wyon. *Evolution and Society: A Study in Victoria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Kuklick, Henrika. *The Savage With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1885-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chneider, Helen.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 三、論文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4，2013 年 6 月，頁 3-88。

王妍妍、夏藝，〈與謝野晶子與周作人婦女解放思想之關係〉，《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5 年第 7 期，頁 73-88。

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39-67。

呂芳上，〈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收入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 207-232。

呂芳上，〈兒女情短、英雄氣長？辛亥革命時期的性別與革命〉，收入呂芳上著，《民國史論》，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 257-291。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4 分，2002 年

12 月，頁 717-723。

周敘琪，〈家庭經濟與現代主婦——邵飄萍譯介《實用一家經濟法》析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1-50。

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卷 43 期 3，2005 年 9 月，頁 107-190。

胡曉真，〈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論《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2006 年 3 月，頁 55-89。

張競，〈与謝野晶子と中国——1920 年代前半に翻訳された評論について〉，《明治大学教養論集》，號 338，2000 年 9 月，頁 1-22。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29-92。

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38。

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為例〉，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233-251。

黃克武，〈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5，2014 年 9 月，頁 129-187。

黃相輔，〈居家必備：《婦女雜誌》在五四前的通俗科學啟蒙(1915-

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0，2018 年 6 月，頁 85-128。

黃喬生，〈選編後記〉，收入姜德明編，《周作人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 345。

羅秀美，〈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單士釐的「女性文學」〉，《漢學研究》，卷 32 期 2，2014 年 6 月，頁 197-230。

嚴搏非，〈論「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理解〉，收入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頁 198-214。

Chiang, Yung-chen. "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25." *Gender and History* 18:3, November 2006, pp. 519-545.

Racel, Masako N. "Finding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Meiji Intellectuals and the Japanese Construction of an East-West Binary, 1868-1912." Ph. D. Dissertatio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011.

Suzuki, Mamiko. "Shimoda's Program for Japanese and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2, June 2013, pp. 1-9.

## 四、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雜誌》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fnzz/index.htm（2018 年 12 月 18 日檢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期刊作者研究平台，http://mhdb.mh.sinica.edu.tw/ACWP/（2018 年 5 月 8 日檢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2018 年 12 月 4 日檢索）。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61742（2018 年 5 月 16 日檢索）。

# What Scientific Konwledge Does a Woman Need? A Debate over Women's Education

Hsiang-fu Huang*

## Abstract

Women's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entered on the ideology of *xianqiliangmu* (wise wives, good mothers) to prepare female students for household life through domestic science. This ideology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at emphasized women's natural duties of raising children and maintaining household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c.1915-1925) challenged traditional values and stressed humanistic thinking. This trend also influenced women's education, and some activists called for a total reform.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zazhi*),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Zhang Xichen and Zhou Jianren, was a representative stronghold for advocating radical reform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20s. Inspired by the works of the Japanese writer Yosano Akiko, Zhang and Zhou promoted *rendejiaoyu* (humankind education) as opposed to *xianqiliangmu*. The objective of *rendejiaoyu* was to cultivate a whole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Zhou's brother Zhou Zuoren also proposed an outline of "common knowledge" in *The Ladies' Journal*, in which he elaborated on his ideal curriculu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promote *rendejiaoyu*. Zhou Zuoren's outline reflected a multi-layered structure: from knowledge about individual bodies, minds, and sex, to biology and human society, and on to the physical sciences and the arts. His system of knowledge also reflected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or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such as social Darwinism and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Key Words: *Funüzazhi*, *xianqiliangmu*, women's education, Yosano Akiko, Zhou Zuoren**